昆明学院学报　2017，39(5)：20～25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环境史】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基诺山“森林交换”为个案

董学荣[1,2]
（1. 昆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2.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基诺山森林交换”，既是当地群众追赶“先进”和对现代文化强烈认同的内在需要驱动的结果，也是国家、市场等外在需要与内在需要相契合转化为巨大的现实需要的产物，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内地化进程及国际政治博弈、国内统筹发展和市场、科技、文化、心理等内外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积渐所致”。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千差万别，动力机制却日渐趋同，从而在更加根本的层面和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揭示了环境变迁的内在联系与本质特征。

关键词：环境史；环境变迁；动力机制；基诺山；森林交换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020－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05

On Driv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Taking the Forest Exchanges in Jinuo Mountain as an Example

DONG Xuerong[1,2]
(1. College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2.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Forest Exchange in Jinuo Mountain is the result of strong internal needs of the local people to catch up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ong cognition of the modern culture, the great products transformed from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xternal need from the country and markets and the internal needs and also the accumulative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omestic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the external interaction from marke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sychology.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tends to gradual convergence with the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and all these show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natural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fundamentally and extensivel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driving mechanism; Jinuo Mountain; Forest Exchange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日益成为环境史深入发展绕不开的前沿问题。从现象描述、动因分析，到动力机制，体现了环境史研究的层层深入。环境史产生近

收稿日期：2017－07－22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云南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实践经验研究”(K6050439)。
作者简介：董学荣(1968—)，男，云南景谷人，副教授，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云南大学环境史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研究和教学。

①王利华指出，环境史“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着重探讨系统内部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历史关系、过程和动力机制”，“从时间纵深之中探寻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彼此因应、相互反馈和协同演化的复杂机制”。钞晓鸿指出：“环境史不仅需要考察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而且还要揭示互动背后的内在机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半个世纪以来,从异军突起、风靡全球到成为显学,对环境变迁的现象描述和动因分析都取得了累累硕果,动力机制则未看到相关专题研究成果。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旨在把握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内在联系,深入认识环境变迁的规律性,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有深度的借鉴,减少形式化、表面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环境变迁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而且有复杂的动力机制,对此关注的缺失,正是某些学科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既功勋卓著而又无能为力的深层次原因,也正是环境史的重要价值所在。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驱动因素是既相互联系又处在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所谓动力机制,“其本质是描述动力与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1]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是构成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的因子,环境变迁动力机制则是各种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环境变迁的作用方式和过程。驱动因素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何种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的是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环境变迁,两者关注的侧重点和层次性有显著差异。“机制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抓住了机制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事物的要领。对机制的研究,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已从对现象的描述演进到对本质的说明”[2]。有专家认为,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比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更确切,即是说,是指自然和人类的各种力量驱动环境变迁的机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因而,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比驱动机制更确切,更深刻。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已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但研究刚刚起步,亟需深化。个案研究是深化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的有效途径。麦克尼尔指出:“要从全球角度阐释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但是如果抓住一些关键因子,对加强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却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3]基诺山森林交换,为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也许正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关键因子”。

基诺山“森林交换”①,是指以橡胶树大规模种植为代表的人工经济林对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整体性置换,是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置换,是单一物种对物种多样性的置换,既是“哥伦布大交换”②在特定时空中的现实性进展,也是当前基诺山乃至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环境变迁的一种典型。基诺山森林交换是多种因素协同驱动的结果,为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提供了典型实例。本文试图以基诺山森林交换为例,深入探讨环境变迁动力机制,以求教于专家同仁。

一、基诺山森林交换的驱动因素

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1963 年,在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国营景洪农场的帮助下,基诺山橡胶试种成功,可见最初在基诺山种植橡胶,并不是当地群众的自觉行为。20 世纪 80 年代初,基诺山开始实施“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方针,把橡胶、砂仁、茶叶作为三大支柱产业。但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橡胶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人们才将信将疑地开始关注这种从外部世界引入的树种。尽管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基诺山的橡胶种植已突破万亩大关,但更多的是为了完成政府分配的定植任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胶水价格开始上涨,当地群众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摇钱树”,种植橡胶的自觉性和热情开始高涨。1990 年基诺山橡胶种植突破 2 万亩(1 333.33 hm^2)。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种植橡胶,1998 年突破 3 万亩(2 000 hm^2)。伴随 21 世纪初橡胶价格疯狂上

①基诺山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不仅以基诺族著称,而且以热带雨林闻名,基诺族先民自古以来“种茶好猎”,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大规模刀耕火种,开始探索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实行“以林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大力发展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乃至基诺山五分之一的热带雨林“交换”成了橡胶等经济林。

②“哥伦布大交换”是一件关于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以及观念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大转换。1492 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这是世纪性大规模航海,也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促进了东西半球及世界各地之间物种的交换。这种生态学上的变革,便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需要指出的是,“哥伦布大交换”是跨越时空的物种传播,尽管其探讨的是1492 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但远远在此之前就已发生而至今仍在继续。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涨,不仅所有适合种植橡胶的地方都开辟成了橡胶林,甚至出现了“毁田种胶”“毁林种胶”的情况,2010 年突破了 10 万亩(6 666.66 hm^2)。橡胶种植面积与橡胶价格呈正比上升。由此可见,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内在动力。那么,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又何在呢? 概言之,是脱贫致富、改善生活,丢掉“原始落后”帽子,实现跨越发展、赶超先进典型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便跨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又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4]。

市场经济的外在牵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基诺山森林交换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没有政府“计划”的推动,基诺山的森林交换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 1963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20 年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面积增长之缓慢也是有目共睹的,直到 1980 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面积仅有 221 亩(14.73 hm^2)。紧接下来的 20 多年间却呈现出“井喷式”增长,2007 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超过 9 万亩(6 000 hm^2),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相比增长了 400 多倍。应该说,这中间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诺山橡胶种植面积的急剧增长和森林交换迅猛发生,正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相一致的。历史上,基诺山是有名的“六大茶山”之一,茶叶生产交换名不虚传,但一般都是以物易物的不等价交换,总体上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计划经济时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基诺山也不能幸免。这也许是基诺山橡胶种植前 20 年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2014 年,胶水价格从 10 余元飙升到 30 余元,基诺山橡胶种植一发不可收拾,从 4 万多亩(2 666.66 hm^2)猛增到 18 万多亩(12 666.66 hm^2)。长此以往,抑或胶水价格照此趋势继续上涨,基诺山的热带雨林也就前途未卜了。专家学者们惊呼:雨林啊胶林![5]1 如此巨变的推手何在? 市场! 2015 年,基诺山橡胶种植迅速扩大的趋势戛然而止。原因何在? 胶水价格一下子回落到了十年前的水平,直到 2016 年,一直在 8 ~ 9 元的范围徘徊。由此可见,市场的力量何其巨大。对此,尹绍亭先生的分析极其精辟:“种橡胶最先发财的是傣族,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山地民族于是相继仿效,趋之若鹜。由于效益好,钱来得快,所以越种越多,想要限制都不行,结果刀耕火种没人干了,绵延了数千年的山火终于熄灭了。近 20 年来,山地民族生计转型的速度之快、之彻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威力。”[6]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旦和国内外市场接轨,其需求是无限的,而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对基诺山的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成为左右基诺山生态环境变迁的力量。

科技力量的推波助澜。天然橡胶生长受到自然环境的严格制约,基诺山原本不在橡胶宜植区①。地处北纬 21°10′以北、东经 99°55′至 101°50′之间的西双版纳原本也不在橡胶宜植区,科学技术对橡胶“生长极限”的突破才使现实需求成为可能。橡胶树喜高温、高湿、静风,原产于南纬 0 ~ 5 度的南美洲巴西亚马孙河流域 7 000 万 km^2 的冲积平原和热带雨林中。1876 年,英国人魏克汉(H. A. Wickham)把橡胶树的种子和幼苗从巴西运回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培育,再将橡胶苗移植到锡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野生橡胶的人工种植获得成功,此后在东南亚的种植逐渐扩大。回顾世界三叶橡胶树的种植历史,自 1876 年魏克汉引种到地球南、北纬 17° 线内种植至今已有 140 多年的历史;国内自 1951 年农垦大面积引种天然橡胶树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而云南民营橡胶自 1977 年发展至今刚好 40 年时间。国际上专家认为,南、北纬 17°和海拔 900 m 是橡胶生长的极限。相关调查规划表明,基诺山属于次宜植区,宜植毛面积 2.48 万亩(1 653.33 hm^2),净面积仅 1.14 万亩(760 hm^2)。科技力量的嵌入,远远突破了橡胶生长的纬度、海拔等极限,达到北纬 26°,海拔 1 300 m 以上,基诺山的实际种植面积超过 18 万亩

①橡胶原产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19 世纪,英国人把野生橡胶种子从巴西带到伦敦,并成功培育出了种苗,并把这些胶苗运到英国殖民地,在锡兰和马来西亚栽种,开始进行系统的橡胶生产,并经东南亚传入中国。参见欧洲环境史学会现任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系教授克利斯托夫·毛赫撰,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译:《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光明日报》,2011 年 12 月 1 日,第 011 版。

(12 000 hm^2),而且还有扩大趋势。与此同时,科技工作者对基诺山的倾情相助、基诺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都帮助人们圆了种植橡胶发财致富梦。科技的力量由此可见,但是,“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7]

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1904 年,刀安仁从马来西亚引进 8 000 株橡胶苗在德宏盈江种植,是云南最早引种橡胶的开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钱仿周等把橡胶树引种到西双版纳。两次引种,举步维艰,发展并不顺利。1978 年,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从云南边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制定了“在我省的边疆民族热区,在林业‘三定’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以民营橡胶为主的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让边疆的兄弟民族与国营农垦农场一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不仅使兄弟民族真正富裕起来,还要实现边疆的安定团结,这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都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发展方针。[8]

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陈寿昌指出,云南民营橡胶从 1977 年至 2007 年 30 年实现 2 次跨越式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二是改革开放新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三是省委、省政府在民营橡胶起步初期的具体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四是改革开放新政策创造的国内外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国内生产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条件. 推动着民营橡胶的发展。[9] 显然,这些都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重要原因。就基诺山森林交换来说,还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打破西方国家包围封锁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家决定把西双版纳建成海南之外的全国第二大橡胶生产基地,开始大规模开垦农场,种植橡胶。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民营橡胶种植得到逐步发展。这为基诺山森林交换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大环境”。二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为此,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了基诺山“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方针,把砂仁、茶叶、橡胶确定为三大“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和发展。三是基诺族的特殊性要求其实现跨越发展。基诺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其生存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党和国家、社会各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橡胶种植成为实现基诺山快速发展的选择。诚如尹绍亭先生所言:“显然,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的保障,要在西双版纳设农场建胶园那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并非自然的选择,亦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国家权力深入该区的表现,是国家政权在该区建构的结果。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史和生态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5]2

文化变迁的屏障解构。“森林孕育的文明”与其生态环境的共生与良性互动形成了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天然屏障,传统文化的快速消失使生态环境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一是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和自然的祛魅失去了最后的生态屏障。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的消解,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终结,以及保护自然的传统习惯法的解体,失去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乃至传统的神林、水源林、护路林、护寨林,都失去了“神灵”的护佑,再也没有不能砍伐的森林,再也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二是现代化的无孔不入和工业文明的甚嚣尘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历史上基诺族“种茶好猎”①,以刀耕火种为主、以采集狩猎为辅,直接获得生产生活资料,橡胶在传统社会没有需求没有市场。橡胶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和产物,人们通过市场出售橡胶产品赚取货币,再用货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从而不断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国际风云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橡胶成为重要战略物资。为打破国际封锁,国家决定在海南、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种植橡胶,使云南成为我国引种橡胶最早的地方。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双版纳橡胶引种已获得成功,但如果没有巩固新生政权和国家独立自主的需要而成为国家战略,没有“国营”农场橡胶种植巨大经济利益的示范引领,当地居民是否能够认识到种植橡胶的巨大经济利益因而不惜毁林种胶、毁田种胶。国际政治逼迫下的国

①《伯麟图说》记载,基诺族“种茶好猎。薙发作三髻,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属思茅有之”。

家战略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双版纳大规模种植橡胶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重要前提条件。二是世界市场的影响。如前所述,国际市场对橡胶的需求直接左右着基诺山的橡胶种植。三是物种全球化的影响。物种交换自古以来就有,只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大交换”才在越来越宽广的范围和领域日益深刻地发生。在这一进程中,原产远隔重洋的南美洲的橡胶树才漂洋过海,经过印度、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来到中国,来到西双版纳,来到基诺山。

二、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探讨

环境变迁动力机制是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组织结构、作用方式和运行过程。基诺山森林交换,是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结果,是历史与现实,内因与外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心理等各种因素深相契合,市场牵引与科技助推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们的需要变成现实的力量有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在相互作用的多重动因中,焦点还是集中在人与自然发生作用的“界面”。人的需要和作为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环境提供的基础条件,基诺山森林交换便不可能发生。凭借现代先进科技,橡胶种植迄今为止也只能达到北纬 26°以南地区。即便在基诺山,也还有亚诺①一带难以收到较好的种植成效。由此可见,自然不是历史的背景或舞台,任何历史都是人与自然的“共舞”。正如克罗农所言:“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10]

现实需要与历史发展的统一形成现实的动力。现实需要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人们创造历史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制约②。基诺山森林交换,看似偶然发生,实则“积渐所致”③。不仅有复杂的现实动因,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影响深埋其中而往往被忽视从而导致短视,“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难免导致“公地悲剧”。

外因主导作用只有和内因主体作用有机结合才能变成现实动力。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基诺山的变迁都打上了外部力量深深的烙印。从攸乐同知的短暂兴废、普洱茶的垄断经营到 1949 年以后的毁林开荒,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以林为主”,莫不如此。但是,诸多外部驱动力量,都要通过内因发生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基诺山橡胶种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而外部力量的“僭越”往往导致环境灾难的发生。只有土著的生存权、发展权、资源权、环境权等都得到保障,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演变才能实现。

科技在环境变迁中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正如江晓原指出:“环境问题不是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因为“环境污染归根结底也不是科学技术带来的”[11]。环境史上的“悲观论”“衰败论”固然有待批判,“唯科学主义”的虚妄正在被人们所认知。环境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

环境变迁动力机制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环境变迁动力机制会因构成要素、主导因素、作用力量大小的不同而改变。环境变迁驱动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不同时代的驱动因素的组成有差异,而且主导因素也有此消彼长,因而,不同时代的环境变迁动力机制会有时空差异。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的组成要素还有地域与民族的差异,因而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驱动因素的多元性、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了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的复杂性。钞晓鸿指出:“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机制十分复杂,涉及环境因子与影响时效,社会经济结构与时空差异,这是环境史研究面临的很大难题。”[12]

当前,中国橡胶已在海南等省区及云南省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地州市广泛种植,南亚、东南亚等地许多国家橡胶种植也有所发展,因而,“基诺山森林交换”,就其空间维度而言,是一个国

①亚诺寨即过去的龙帕寨,由于海拔较高,橡胶种植一直都不成功,是基诺山迄今为止唯一没有种植橡胶的村寨。

②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85 页。

③《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安者非一日而安,危者非一日而危,皆以积渐然。”

际性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基诺山森林交换”是“哥伦布大交换”在当代基诺山的延伸和体现,是具有时代性的“哥伦布大交换”的前沿问题。“哥伦布大交换”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典型现象,意味着“基诺山森林交换”所揭示的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广泛存在于诸多领域的环境变迁之中,亦即不同的环境变迁,其动力机制日益趋同。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等,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其显著特点就是“标准化”,是对无差别的同一的追求。“反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意味着对这种同质化的根本否定。一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同质性因素增加。看似无关的国际政治和世界市场两种力量,在基诺山森林交换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 世纪人类成为影响环境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基诺山也与世界同步。二是环境问题与制度设计的关联。约阿希姆·拉德卡指出:“很显然,社会制度与环境状况存在紧密联系。一般来说,环境问题源于缺乏克服短期利己主义和有利于长期集体生活条件的能力的社会。”[13]三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共同性。“生态危机常常伴随着权力使用的机会”,“环境问题,尤其是水和森林的利用很早就成了政治问题”。[14]101四是资源权属对环境变迁影响的共同性。“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很简单,即在所有的地区,如果当地居民没有能力控制资源,限制外来人口,环境就会恶化。”[14]30五是人的需要的共同性①,具有共同的“文化迫力”②,而人的需要的实现尽管可能有多种途径,但都要受到这种共同需要的制约。六是“道法自然”的“宿命”。自然是最高的法则,退一万步说,“人定胜天”目前为止尚不能证明。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5]1962 年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时嘱咐:“林区开荒不能破坏自然,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16]由此可见,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结果和影响,尤其是“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往往成为“公地悲剧”的根源。

[参考文献]

[1]王旭科.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08.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 4 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23.

[3]何钢. 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二十世纪环境史[J]. 世界环境,2008(1):91.

[4]董学荣. 基诺族的“跨越”与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J]. 云南社会科学,2010(1):12-16.

[5]尹绍亭,深尾叶子. 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6]尹绍亭,耿言虎. 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开拓:刀耕火种研究三十年回眸——尹绍亭教授访谈录[J]. 鄱阳湖学刊,2016(1):48-61.

[7]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35.

[8]陈寿昌. 云南民营橡胶的三个跨越四大效益[J]. 云南民营科技,1996(5):28-33.

[9]陈寿昌. 云南民营橡胶 30 年[J]. 热带农业工程,2009(4):55-58.

[10]CRONON W.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3,17(3):18.

[11]贾雷德·戴蒙德.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M]. 江滢,叶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序言.

[12]钞晓鸿.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沿与展望[J]. 历史研究,2014(6):24-28.

[13]包茂宏. 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J]. 史学月刊,2004(10):91-95.

[14]约阿希姆·拉德卡. 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 王国豫,付天海,译.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16]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团.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R].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19.

①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已对此做了深刻揭示。

②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相关论述,他认为人类有机的需要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迫使任何文化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